

《俄苏翻译理论流派述评》一书中的可译性问题论述

黄 媛

天津外国语大学 300204

摘 要: 在《俄苏翻译理论流派述评》一书中,可译性问题是苏俄现代译论的四个核心问题之一,围绕这个问题,俄罗斯的许多翻译理论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证,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本文试图归纳总结俄苏翻译理论中关于可译性问题的主要观点。

关键词: 翻译理论;可译性

《俄苏翻译理论流派述评》一书内容全面丰富,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众多翻译理论家的翻译学思想。翻译活动在基辅罗斯时期就已出现,并不断发展,与之发展的是翻译家对翻译活动的认识和看法。普希金的论述使翻译文学从本土文学中独立出来,而别林斯基则首次提出翻译问题的“理论”一词。俄苏翻译家们就翻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观点,推动了翻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前,文艺翻译理论曾在苏联占主导地位,20世纪中叶开始,译坛渐渐摆脱了传统的、特别是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开始向现代翻译理论——现代翻译学方向发展。在诸多理论著作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费奥多罗夫的《翻译理论概要》,该书在苏联论坛引发的论战使得论坛分为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语言学派的代表有列茨克尔、费奥多罗夫、巴尔胡达罗夫,文艺学派代表有高尔基、楚科夫斯基、卡什金、加切齐拉泽、托佩尔等。两派争论不休,最后语言学派一统天下。新一代的语言学派也被称为理论研究者。科米萨罗夫提出“现代翻译学”的概念,提倡对译学进行跨学科研究,使得俄罗斯的译学跨上新台阶。苏俄现代翻译理论中,有四个核心问题:翻译本质问题、可译性问题、翻译单位问题和翻译等值问题。俄罗斯的翻译理论家都是持可译性观点,下文将具体阐述相关理论家有关可行性问题的论述。

一、该书中相关翻译理论家的可译性问题观点

1.1 费奥多罗夫

费奥多罗夫认为可译性是语言的本质,是翻译的最基本范畴,凡是符合原语语言规范的材料都是可以翻译的。他认为,1)人类的同一性决定了翻译的可行性,2)可以性原则适用于符合原语语言规范的材料,严重偏离文学语言标准且带有明显的地方色彩的材料,其可译性具有局限性,3)可译性原则是针对整个作品而言的。在他看来,语言中不可翻译的特殊东西确实存在,但是这不足以从根本上推翻可译性原则。

1.2 什维策尔

什维策尔认为,尽管在跨语言交际过程中存在一些困难,翻译原则上是可行的。绝对不可译的观点是把翻译只看作是纯语言层面的活动,而翻译实际上是言语层面上进行的。可译性是个相对的概念。可译性有文本局部可以和文本整体可译的区别。和完全等值是理想化的翻译一样,完全可译也远不是一个总能实现的理想。为了达到主要的交际目的,必须放弃部分信息。这使得翻译必须以等同为条件,并且翻译的结果只能实现部分等值。可译性原则在允许丢失部分信息后仍然成立,因为所丢失的信息在文本中处于次要地位,所保留的信息是最主要的。

1.3 拉特舍夫

可译性是一种规律,也就是说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进行翻译的。双语交际中,由于双语文化差异的存在,其有效性低于正常的单语交际,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译。单语和双语交际中都存在“不完全理解”、“不理解”和“低可译性”的现象,然而社会实践却早已证实了言语交际在整体上的高效性。

1.4 科米萨罗夫

尽管所传达的信息部分损失,交际的原则可能性揭示了“不可译理论”的错误性。“翻译不可能”的论断基于只有完全忠于原语的译文才是翻译,如果有所损失就不是翻译这一错误的前提。然而,翻译是使跨文化交际成为可能的手段,也就是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之间的交际。没有任何根据要求跨语言交际过程中不能损失“单一语言”交际所特有的信息。现代翻译学承认在对传达信息的部分元素进行可能的删减、补充和改变前提下的原文相关内容的原则可译性。

1.5 斯多布尼科夫

在斯多布尼科夫看来,可译性问题可以解释为:1)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的原则可能性;2)原语语言在译语中找到对应的可能性。促进可译性发展的因素

有两个：一是广义上各民族的自身发展，进而引起各民族语言的发展和相互丰富；二是民族间接触数量增多促进了可以性的增强。阻碍完全可译性的限制性因素分为纯语言限制和由两种文化差异决定的语言外限制。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原则上是可能的，但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些限制并不阻碍语际交际在足够完整范围内的实现。

二、对上述翻译理论家观点的分析

根据《俄苏翻译理论流派述评》中的阐述，可译性是指在使用两种语言进行交际的条件下客观传达信息的现实可能性。语言的同质性使不同语言民族之间的翻译行为成为可能，即可译性，语言的异质性又给翻译带来可译性的限度。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是相对的。费奥多罗夫认为相比于局部的可译性，整体的可译性更易实现，这一观点是基于对语言结构不同的考量。什维策尔从语言和文化两个角度解释了部分不可译的因素解决方法。什维策尔的可译性原则认为，在保留主要信息的同时可以适当牺牲次要信息，这种观点是一种相对可译性观点，牺牲一定的次要信息就意味着信息传递的不完整。斯多布尼科夫则是从语言和文化两个角度阻碍翻译的可译性因素进行说明，并提出促进可译性的因素是语言和文化的相互丰富。上述翻译理论家的观点表述虽不相一致，但是核心意思却是相同的。即承认翻译的可译性的同时指出限制可译性的因素。

对于翻译的可译性问题相关的讨论，需要同与之相对的不可译观点对照起来分析。不可译的观点自十九世纪以来就在西方流行，这一观点是基于对不同语言和民族文化。不可译现象不仅仅存在于方言、行话、双关语之中，日常生活的很多具有民族特色的事物概念严格而言也是无法翻译的，比如汉语中的“喝汤”，如果直译成俄语的话就变成了“пить суп”，然而这里的“пить”在俄语中为喝，俄罗斯语言文化中却没有“пить суп”这样的表达习惯，俄罗斯的汤不同于中国的汤，中国的汤通常是以水为主、固形内容物所占比例不大，因而通常与喝这个动词搭配；俄罗斯的汤较之于中国的汤则显得十分粘稠，甚至在中国文化中无法成为汤，这样的话俄罗斯人认知中的的汤就无法像中国人认知中的的汤那样“喝”了，因而便形成“吃汤”这样一个固定搭配。反过来，“есть суп”也不能翻译成汉语“吃汤”。

解决翻译中的不可译问题也是翻译家所关注的问题。主要的解决途径有补偿、删减和改写。补偿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将词语或句子所隐含的语义表达出来，比如日语“今夜月か綺麗ですね”，字面意思是“今晚夜色很美”，这句话通常被用来表示“我爱你”之意，因而在翻译时

如果单纯地译成“今晚夜色很美”则会使译语无法表达原语的意思。在翻译时可以翻译为“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或者直接译为“我爱你”，抑或是在翻译成“今晚夜色很美”的同时进行注解（今晚夜色很美：日语中的委婉表达，用以表示男子或女子对异性的爱意）。删减是指牺牲原文中的次要因素以保证整体意义的传达。比如，“Он хороший человек, я его люблю и не хотела бы заплатить злом за его хлеб-соль и все добро ко мне”翻译为“他是个好人，我爱他，不想恩将仇报”。原文中的“хлеб-соль”的文化伴随意义是好客。在俄罗斯传统中，通常以面包加盐欢迎佳宾，хлеб-соль也就成为了表达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现象的词语，汉语中没有类似表达。为了传达整体的语义，就不得不牺牲面包加盐这一语义及其蕴含意义。改写是指为传达原文的效果对译文加工时进行艺术加工，使译文摆脱原文字面语义的束缚，以达成交际功能的等同。如：“Вчера была червонная калина, а теперь стала белая берёза.”译文为：昨日还是一位红颜少女，今日却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妇。Калина和берёза本是俄罗斯的植物名称，其文化引申意义在汉语中并不存在，为了传达原文的意思，就必须经过改写，是其变成译语接收者所能理解的语义形象。

三、结语

总的来说，俄苏翻译家们准确地认识到了翻译的可译性，并且对阻碍可译性实现的因素有深刻的认识，一些翻译理论家甚至还提出了对这些阻碍因素的解决方法，这对翻译可译性问题的解决和翻译理论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可译性的依据在于人类所面对的客观认识世界的统一的，因而在其基础上的人类认识和思维也具有同一性。同时，作为思维和认知表达手段的语言也具有概念和逻辑载蓄的相似性。翻译材料总体上可译，也有部分不可译，处理和解决不可译的因素正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要面对和解决的事情。

参考文献：

- [1]殷优娜, 李杉杉. 旅游文本中文化意象的翻译策略——以泉城济南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34(03): 191-194.
- [2]丰国欣. 范式视角的不可译性和可译性[J]. 外语研究, 2005(02): 56-60+65-80.
- [3]黄凌翹. 可译性及其限度[D]. 湖南师范大学, 2002.
- [4]黄信. 译学悖论：“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从民族文化负载词谈起[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10, 24(04): 111-115.
- [5]刘传珠. 可译性问题的语言功能观[J]. 中国翻译, 2000(01): 31-34.